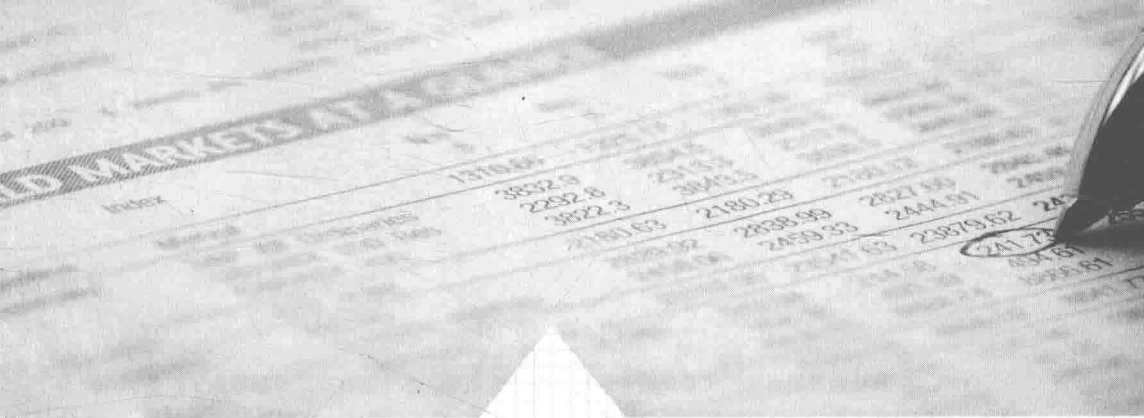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中国票据史研究丛书

本书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从底层社会看历史

国家、企业、乡村与票据

梁宏志◎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从社会底层发现历史是票据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本书围绕底层票据展示了作者的研究成果。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研究方法论,国家与票据,企业票据,乡村与票据。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包括前人的学术史追溯,方法论的探讨;在国家与票据方面,包括银行的借贷,公债的发行,银元券的评述;在企业与票据方面,包括商业店铺的人力股制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在乡村与票据方面,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私人借贷,苗疆的土地转移与分配,集体化时期的集市贸易与供销社等。

本书适合社会学、历史学及金融学领域人士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底层社会看历史:国家、企业、乡村与票据/梁宏志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

(中国票据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47951-8

I. ①从… II. ①梁… III. ①票据—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F8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0627 号

责任编辑:李 娟 李春伶 董晓舒 / 责任校对:王 翔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八度出版服务机构

编辑部电话:010-64005207

E-mail:lichunling @ 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字数:292 000

定价:64.00 元

本书主要研究人员

梁宏志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
常明明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
徐锋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
卢忠民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副教授	博士
李飞龙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
刘岩岩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博士
王倩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博士
徐锋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博士

目 录

第一编 研究方法论

第一章 票据研究需要“向下看”	3
一、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向下看”	3
二、“向下看”的多棱透视	5
三、票据研究“向下看”的价值与意义	6
四、票据研究“向下看”面临的困难	7
第二章 近 20 年的法币改革研究综述	9
一、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	9
二、币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	10
三、币制改革与白银风潮的关系	13
四、币制改革与中国外交的关系	14
五、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7
六、法币与金圆券、银元券的比较研究	18
七、其他方面	19
八、中国港台地区和美国、日本学者的研究	21
第三章 乡村地权市场研究的范式、逻辑与史料	23
一、在“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之间	23
二、国家政策和乡村习惯的逻辑结构	25
三、经济史料的解读与数值估算的合理性	26

第二编 国家与票据

第四章 借贷之间的银企关系与实业发展	31
一、交通银行对实业的贷款扶助	31
二、构建银企关系的绩效	39

第五章 1949 年南京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	45
一、遏制金圆券极速膨胀的颓败——银元券的发行背景	45
二、挽回经济、政治、军事全面失利的危局——银元券粉墨登场	47
三、有关各方的态度反应	48
四、银元券的迅速崩溃及原因	50
五、余论	53

第六章 1950 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述评	54
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情况	54
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特点	57
三、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经验	58
四、结语	60

第七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中小卷烟厂的发展	62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地区烟草工业的市场缺口	62
二、外来烟厂的强势进入	63
三、夹缝中本地中小烟厂的最后辉煌	63
四、盛极一时后的迅速衰落	69

第三编 企业与票据

第八章 近代北京商业店铺	73
一、北京商业店铺中的人力股	73
二、人力股制度的绩效	82

第九章 近代北京商铺人力股制度的再认识	85
一、职工人力股份的获得及变动	85
二、人力股制度的物质激励之表现	89
三、对人力股制度的评价	94

第十章 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	98
一、商业账簿之重要性及其真实性	98
二、万和成及其联号账簿概述	101
三、账簿之史料价值	106

第四编 乡村与票据

第十一章 清代至民国时期山西货币地租	117
一、商业资本的发展是影响货币积累和货币地租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117
二、商业性农业的繁荣是货币地租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122
三、田赋的折征是货币地租产生的媒介	124
四、货币地租的产生过程	125
五、关于货币地租额问题	130
六、结语	132
第十二章 贫困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前苗疆农家经济分析	135
一、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135
二、土地租佃与雇佣关系	138
三、家庭副业与手工业	141
四、农家收支与生活	142
五、苗家贫困的根源	145
第十三章 近代苗疆土地所有权转移问题研究*	148
一、土地买卖	149
二、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其他形式	153
三、讨论	156
第十四章 “集中”抑或“分散”：近代苗疆农村土地的分配关系	158
一、近代苗疆农村土地的分配关系	158
二、土地分散的推动力	163
三、分散与不均并存	166
第十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私人借贷的停滞及缓解措施的历史考察	167
一、农村私人借贷的停滞状况	167
二、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停滞的原因	173
三、活跃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的措施及成效	179

* 基金项目：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土改后黔南地区改造落后村运动与乡村社会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ZH101）。作者简介：李飞龙（1981—），男，江苏连云港人，法学博士，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现代乡村史。

四、结语	183
第十六章 土地改革后农村私人借贷形式及利率的历史考察	185
一、农村私人借贷形式	185
二、农村私人借贷利率	190
三、农村私人借贷的社会经济性质	195
第十七章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国乡村借贷方式比较研究	198
一、借贷对象	198
二、贷款利率	202
三、借款用途	204
四、借贷信用和手续	206
五、贷款期限	207
第十八章 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的关系	210
一、国家权力的介入、集市贸易的兴衰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211
二、国家权力与农民利益在基层市场上的冲突与协调	214
三、博弈中的农民意愿行为和沟通疏导渠道	219
五、结语	221
后记	223

第一编 研究方法论

第一章 票据研究需要“向下看”

近年来,我国历史研究开始了眼光“向下看”的学术转向。在经济史研究中,这种学术转向体现得尤为明显,出现了经济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合流的倾向。这样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顺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与官方史志资料记载不同的是,民间经济史料在形式上更为原始质朴,内容上也往往更真实可靠,因此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票据是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面相,对票据的研究不仅可以追溯社会经济变迁的演进纹路,还可以丰富对社会经济运行之外的其他层次的深入研究。票据研究要“向下看”必须做到“走下去”、“浮上来”、“化出来”,即收集民间票据史料、对史料进行常规梳理归纳、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解决之。“向下看”作为一种学术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具体运用到票据研究上有哪些意义或者说该如何操作,还有,票据研究的“向下看”在实际中面临哪些困境,本书从以下四个方面简略探讨了以上诸问题。

一、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向下看”

近年以来,史学界出现了“向下看”的趋向,即将研究的视角及重点由上向下移转,由以前关注上层社会、精英群体及政治经济等主流领域转到关注社会下层民众及庶民文化,试图通过还原出一幅底层社会生活的全息化图景,从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向下看”逐渐成为一种史学新视角、新方法,这是对传统“向上看”史学的一种调拨。长期以来,史学的叙述主线是研究上层领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政治事件、历史事件,经济、军事、文化在这种历史研究中只是附带的笔墨,基层社会尤其是亿万底层群众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等,不受重视,人们对其关注度也不够。“向下看”的历史研究就是要给基层社会和广大民众更多的关注,从底层的角度,从一种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向下看”虽然只是简单的研究思维与视角的转换问题,但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为人所熟知、所接纳,却经历了100余年的时间。20世纪初,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与西方文明的输入与影响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新民

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发聋振聩地提出“史界革命”的呼号，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何改造史学？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什么样的记录和描述才算真正的历史？梁启超的回答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然后，梁启超从理论上批判了旧史学的六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他主张破旧史学而立新史学，认为历史学应当“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①。显然，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概念，相比帝王将相的旧史学而言，更多的是指一种不同以往的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与新方法。视角的转换，首先由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的那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开始践行，“社会史遂有取政治史而代之之趋势”，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史学重新沦为了政治史的“婢女”。进入80年代以后，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史学界开始全面反思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开始思索与尝试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受西方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启示，中国史学界开始回归20世纪上半叶开启但并没有延续下去的“向下看”，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的研究倾向。所以，“向下看”作为一种研究思维与方式真正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

“向下看”就是要求史学研究放低姿态，视线下移，注意到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胞与胚胎，“一滴水中见大海，一粒沙中见世界”即是此理。通过对微观层面的研究，以小见大，勾勒和展示社会的全貌或者以前为人忽略了的地方，这并不是管窥蠡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丰富和完善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使研究走向深层和深化。^②在“向下看”作为研究视角之前的研究有一个通病，就是往往抽象、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的宏观问题，而忽略了对全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证研究或解构研究，从而并不能呈现时代与社会的整体风貌。再加上，底层有丰富、鲜活的史料，它们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是历史研究的一座宝库。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每一次史学的重大进步，都是和一批新的重要史料的发掘密切相关。在当前关注基层社会、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一种学术理路和趋势，票据研究的深入和底层文献的大量收集与利用密不可分，必须“向下看”，向下进行研究。

①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页。

② 忻平：《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二、“向下看”的多棱透视

“向下看”作为研究方法，强调从底层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自下而上看社会、看历史，从而发现社会历史更加丰富和玲珑的内涵与色彩。它挑战了以往只研究上层的政治史之英雄史观，重新发现了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视或遗忘的人们，主张把视线移向社会下层民众，将以前的“失语者”重新请回历史舞台，从而对历史有个整体看法。所以，“向下看”并不仅仅只是“添补”历史，还是在丰富和完善历史，使社会的各类人群、历史的不同主体的面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让历史真正得以回到“原生态”。因此，“向下看”的研究是一种原生态式的历史研究。

社会的构成是多元复杂的，对社会历史的研究需要多维度、全方位的观察角度，任何一种范式都不能研究、解决好所有的问题。所以，“向下看”只是分析研究问题的一种手段或方式，一种解释问题的思维角度，一种研究路径的心理倾向。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向下看”与“向上看”并没有截然对立，因为“向下看”并不意味着研究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历史事件与现象，通过研究让历史呈现出一个立体全景。所以，“向下看”只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角度与切入点。

“向下看”的研究把目光放到更为宽广的领域，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由此可带动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需要注意的是，“向下看”的研究不是单纯描述底层世界里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也不是为了满足对一个我们过去不甚了解的一些领域的猎奇心理，而是在对底层社会的认识与研究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一段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一段国家的记忆与历史，为历史书写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① 基于此，“向下看”的历史研究也应有全局化或全域化概念，应该是底层社会的“整体的历史”，即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底层社会，从底层社会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展现出底层社会的立体全景。这一立体全景，应该既有官府的渗透，又有民间的根底；既有文人的书面文化，也有从民俗文化中产生的社会价值观和群体规范，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呈现出总体的架构。所以，“向下看”应该是一种底层社会的社会史研究和综合研究。

“向下看”不单单是研究问题和视角的转换，更是对研究者史观的考验。如

^①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页。

何看待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如何看待历史的主体？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眼光向下，“向下看”的研究也才能真正拥有它的意义。“向下看”通过对下层社会真实透彻的了解，杜绝那些不着边际的评论，消除研究中的偏见与定式，通过深入历史“现场”，获得经得起时间考验又有价值的学术创见。这样，虽仍难摆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论上的困惑，但是展现了一个更为客观而全面的底层社会。所以，“向下看”应该是一种客观而平和的研究态度，应该摒弃“先入为主”的精英/民众、大传统/小传统/、国家/社会等鲜明的二元对立，而要把握好二者的关系，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地方社会，如何共享一种文化。

三、票据研究“向下看”的价值与意义

1. 票据研究的史料价值

就票据研究而言，“向下看”首先体现在史料的收集上，即对底层票据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解释、研究方面。在底层票据材料收集与使用方面，侧重点将是非官方的商业契据，这包括民间借贷、商业字据、贸易契约、经济文书等，乃至一些商业契约碑刻、古会馆建筑、民间贸易集镇等实物遗迹。对这些民间票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可以弥补官方社会经济数据的不足，为研究提供丰富而可靠的经济数据资源。而且，所有资料，不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应当被理解为基层各种势力经济联络互动的结果。在这种理解下，我们将乡村票据史料放到更广阔的区域历史背景与鲜活的社会文化中加以考察。我们认为只有将这两种票据资料——官方的与民间的、上层社会的与下层社会的，与两种研究理路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基层经济单元的完整理解，也才有可能建立起对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总体特征的认识，并通过民间经济的活动去寻找中国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或新的解释框架。^①同时，在力图沟通基层票据文献和官方票据文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面临一个史料的解读问题，因为民间史料有一个民间的习惯与文化，不能回到历史“现场”，就将很难理解民间经济的联系与脉络。

2. 票据研究的经济史价值

票据作为一种经济史料，其在经济史上的价值自不待言。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内中总有某种规律可循，因此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找准经济发展中的中心线索就显得相当重要，因为找准这条中心线索或曰主线索，可以有效地联结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分，有助于认识经济总体发展的性质、水准和趋

^① 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华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676页。

势,获得提纲挈领之功。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演变。^①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本联结方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达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通过市场价格支配人、财、物等资源的移动,这些特性决定市场经济本身需要有相应的条件配合。这些配合条件,也可以称之为市场的要素,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货币、信用、人力资本,还包括各种服务和精神产品如信息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还有各种权利,如专利权、知识产权,还有未来的产品如期货、期权等。这些纷繁的要素或配合条件,不仅可以从国家大的方面去找寻,还可以从底层和基层小的票据上“窥一斑而知全豹”。

3. 票据研究的社会史价值

眼光向下重新审视历史,可以全面揭示出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展现出传统社会各类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恰好是驱动“向下看”研究视角的两翼。所以,“向下看”研究票据不仅具有经济史学上的意义,还具有底层心态史与生活史研究的重大历史价值。通过收集研究底层票据,考查草根社会群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真实展现在经济发展或者政治革命运动等宏大历史变迁背景下底层社会群众的日常生活形态。底层的历史、地方自治与权力结构、乡村经济与农民生活问题、民风民情、乡村雇工、乡村社会分层、宗族制度、土地制度、水资源利用、乡村工业化、农村市场、钱会组织,以及婚姻、生育、饮食、赌博、两性关系、秘密社会、民间信仰、习俗文化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底层票据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借用新史学的一些方法进行非经济史方面的深入研究。

四、票据研究“向下看”面临的困难

1. 票据史料比较分散

基层票据史料虽有研究上的重大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票据史料“缺位”的困境。所谓缺位,指的是票据史料的分散,收集不易,有可能在经济史研究中默默失声。全国各大中图书馆、专业型高校研究机构如财经类高校,还有科研单位都有所收藏,但相比湮落于民间的票据史料,这些都是沧海一粟。但是,民间票据史料可能又存在着保存并不完整,且不成系统,或缺失严重这样一些问题。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民间票据一直尘封在基层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或者企事业单位档案室,一直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还有,因为票据史料分散凌乱,所以仅凭个人之力,毕竟难见成效,也难窥全貌,更遑论用其进行

^① 朱荫贵:《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深入的专题研究。

2. 票据整理与利用工作量大，难度也大

中国传统社会票据拟定的形式大同小异，但所用的表述文字、符号系统，不同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研究者如果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很难解读与识别。而且，民间票据有一些惯常表述与习俗定法，如方言用字用语、行文风格等，不了解的人可能刚开始会有云雾之感。要充分理解票据中语言、数字记录的意义与内涵，还需要借助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弄清票据史料所反映的特定的时期、地区的制度文化背景、民商事习惯等。对民间票据的整理和利用，需要学者具备多学科的知识，需要跨学科的研究。

3. 票据研究需要计量经济学方法

这是一些经济史学者研究的短板。受时代的局限，传统史志中除了关于地丁、钱粮等财政收支方面的数据相对比较系统外，其他社会经济史料方面的记载则多为一般的定性描述，精确的数量记录极为稀缺。^① 票据史料作为单张票据而言，算“精确”的数量记录，但作为一个整体看，如一沓、一叠票据，数字记载就显得模糊与杂乱，这时候需要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及计算机数据库等方面的知识，而这往往是国内一些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学者所不太擅长的。票据研究，需要学者具备多学科知识，或者多学科学者之间交流沟通，紧密合作，共同攻坚。

第四，受传统研究模式的影响，重新构建文本问题模型可能较为困难，从而影响了“向下看”。票据除了反映基层社会一些经济和商业的联系外，还深刻地反映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如果研究者只是姿态型的“向下看”，认为底层票据都是关乎贩夫走卒的一般日常生活，那么这种在骨子里还是俯视或蔑视下层社会的心理，使得研究者以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票据，其看出的是零碎琐屑的东西，看不出潜藏在小人物命运之上的社会变迁因子。那么，虽然资料已经形成了文本，但因为不是以底层人物的眼光看底层，不是以底层人物的身份去体验感受底层的文化经验与生存状态，那么，就可能很难构建新的有说服力的问题模型，其研究的结果仍旧是宏观层面所看到和反映出来的问题。

^① 袁为鹏：《商业账簿史料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

第二章 近 20 年的法币改革研究综述

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无论在经济、金融史还是在政治、外交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中国漫长而又坎坷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自然成为历史学乃至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郑会欣先生曾对 1982—1986 年国内出版的有关币制改革问题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做了一个系统的耙梳和述评，从币制改革的原因、性质、作用及影响，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①，使人深受启发。近 20 年来，正如郑先生所希望的，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我们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研究做一新的综合性的述评，本书即是一个尝试。

综观近 20 年来的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

对于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的论述基本一致，现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罗列如下，以供读者参考比照。

孙宅巍先生认为其条件有两方面，国际上美国的白银政策，迫使中国放弃银本位制；国内一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相对发展，要求对落后的币制进行改革，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金融组织控制的加强，为改革币制做了组织准备。^② 刘枫也认为官僚金融资本的形成和扩张是币制改革的组织准备，而“废两改元”为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原因有四方面：①银元币制的混乱，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②币值不稳；③日本走私白银的侵略；④白银外流的压力。^③ 诸葛达认为原因有三方面：①中国长期以来庞杂紊乱的货币制度迫切需要改革；②“废两改元”的施行和“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③美国的白银政策冲击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④

① 郑会欣：《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② 孙宅巍：《对国民党政府三次币制改革的综合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3 期。

③ 刘枫：《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及其意义》，《上海经济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④ 诸葛达：《国民党政府 1935 年的币制改革》，《浙江学刊》1995 年第 4 期。